

# 对翻译研究之文化转向的反思

作者：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付玉群

**【摘要】**该文对苏珊·巴斯尼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在翻译研究的地位和《文化构建》一书主要内容进行概括，对翻译的交际功能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使得翻译的文化转向成为必然；文化转向对译者策略提出新的要求；针对当下存在的相对的两方面观点质疑翻译研究之文化转向的发展前景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文化转向；文化构建；译者策略；本体论

翻译学研究是目前发展最快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之一。《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文集》(Bassnett & Lefevere, 1998)是苏珊·巴斯尼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于1998年合出的一本关于文学翻译中文化转向的一本集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们是文学“操纵派”的代表人物，主张翻译不是一门次要的、派生的学科，而是一门文学研究的主要工具。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正当许多学者正缓慢地向着文化转向迈进时，苏珊·巴斯尼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首先旗帜鲜明地提出翻译的“文化转向”，担当了领头羊的重要角色，强烈主张把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更为紧密地结合。埃德温·根茨勒在该书序言中对两位对翻译领域所做出的贡献做出了高度评价：“他们在翻译跻身于学术领域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远超过同领域其他学者；他们也不断构建翻译领域内部和翻译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桥梁，一直走在这门新兴学科发展和革新的前列。”(Bassnett & Lefevere, 1998: ix-xxi)

《文化构建》一书包括苏珊·巴斯尼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文论和主要思想。全书包括二人合写的前言和八个章节，其中包括安德烈·勒菲弗尔撰写的第一章“中国和西方对于翻译的思考”、第三章“翻译实践和文化资本的流通：一些英译叙事诗”、第五章“类比之门：英译的《卡勒瓦拉》”、在第七章“归化贝尔特·布莱希特”，以及巴斯尼特撰写的第二章“何时翻译不成其为翻译”、第四章“移植种子：诗歌和翻译”、第六章“仍被困于迷宫之中：对于翻译与戏剧的进一步思索”和最后一章“文化研究中的翻译转向”。二人的作品在该文集中互为参差、互为补充，是难得的集众多翻译研究于一体的文论集：其中包括了中西译论、可译性的限度、翻译何时不成其为翻译、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等方面；有的论文还针对一定体裁，如戏剧翻译、诗歌翻译；有的重在个案研究，讨论了维吉尔、布莱希特等人作品英译后的境遇等问题。埃德温·根茨勒教授为该书集撰写了精妙绝伦的前言。

笔者拜读完此书，受益匪浅，感触颇多，对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产生了些许思索：

## 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必然

在笔者看来，翻译研究走向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的必然趋势，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讲，即翻译的实质功能和现在全球化发展的普遍趋势。首先，翻译的交际功能决定了翻译的文化走向。在《翻译学：问题与方法》一书中，沃尔弗拉姆·威



尔斯指出翻译是不同语言间交流的一种现代方式。交流的涵义是极其广泛的，不仅仅包括对于源语字面内容的信息传达，同时包括了源语的文化氛围，即经济、政治、军事、历史以及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

其次，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也使得文化成为了各民族交流的重中之重，翻译也不免要进行研究策略的改变，以适应时代发展。“在一个‘文化’无所不包、无孔不入的全球化时代，翻译更是难以摆脱‘文化’的阴影了。”（王宁，2005: 7-11）在全球化的社会大背景之下，各民族需要积极参与到国际社会之中，彰显自己的文化，促使自我文化的国际出现和增进自己文化在国际舞台中的权力，从而要求翻译更加突出地传达如民族史诗般的文学作品中的文化之内涵。

## 二、“文化转向”下的译者策略

巴斯尼特和勒菲弗尔提出了三种翻译模式：贺瑞斯模式，强调译者偏向忠实于目的语读者群体；杰罗姆模式，强调译者忠实于源语文本；施莱尔马赫模式，强调针对目的语读者而保存源语文化的异质。巴斯尼特和勒菲弗尔的多重模式对于不同时期在不同文化中研究翻译非常有效。那么在“文化转向”之下，译者又该采取什么策略，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呢？是否应该走出对原作内容的传达而趋向于充当“文化掮客”呢？还是为凸现本民族文化而对原作进行归化，解构之后再重构呢？或者说译者应该是采取归化策略还是异化策略？这样古老的命题与疑惑实在源远流长。

笔者认为应该针对不同时期，不同翻译意图和具体文本来确定翻译中对文化参数的保存度，从而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例如，早在五四时期鲁迅先生的译文，那些看上去有些别扭的句式和异味的文化词汇给人印象实在深刻，台湾某大家曾宣言说鲁迅先生的作品文法不通，根本不是合法的中文，但是笔者却认为，鲁迅先生是为了能为那时闭塞、封建的中国社会引入异质文化，唤醒沉睡中的东方巨龙，而采取了异化策略。这有其伟大的历史意义，也彰显了先生之赤子情怀，让人敬仰。而在当今文化全球化的局势之下，译者更应该审时度势，采取利于文化传播和本民族发展的策略。

## 三、“文化转向”何去何从？

一方面，一些研究者认为，文化转向势必促使翻译研究的大发展。随着翻译的文化转向，翻译更加紧密地同社会、政治、历史等因素相结合，在这一过程之中，弱势文化势必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弘扬，而文化霸权主义也会得到消解，这是符合国际化发展的；并且在全球化发展之下，文化转向也势必促进全球化文化的趋同性以及调和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使得多元文化得以共存。

另一方面，也有研究者表明，文化转向消减了翻译本体，必定走向迷宫，难以寻觅出路。文化内容仅仅是翻译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而已，而文化转向有过分强调这部分内容之嫌；这样一来就可能导致翻译的本末倒置、轻重混淆，影响原作精髓的传达，损害原作的艺术价值和美学效果。正如曾文雄所言：“‘文化转向’倾向于脱离传统翻译观的本体研究，用文化研究取代语言研究；文化学派其实没有形成普遍的翻译理论来合理地描写翻译过程，而是夸大了文化的制约作用，其从外部因素切入翻译研究的结论也只是经验性的归纳；‘文化转向’只是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不应是翻译研究的全部。”（曾文雄,2006: 45-47）。可见，翻译研究是否该重拾本体论研究而审慎看待文化参数，这有待商榷。那么翻译的文化转向又能走多远呢？这是笔者读过《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文集》所疑惑而不得解的问题，也是在以后的研究中旨在去解答的问题。

在过去几十年间，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都经历了三个阶段：文化主义阶段、结构主义阶段和后结构主义阶段，从而，在跨学科研究成为研究潮流的今天，二者之间的结合也是必然，但是怎样结合，结合到什么程度，以及具体结合的策略何在，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探索和研究。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也是翻译学发展的必经之路，这一理论的发展也势必影响翻译实践的



发展和完善，反之亦然。

**【参考文献】**

[1] Bassnett, Susan and Lefevere, André.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C],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8.

[2] 米歇尔·巴拉德，“结之以构，论之以理——解析‘译者行为’”，《国际翻译学新探》[C]。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

[3] 王宁，“翻译的文化建构和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中国翻译》[J]，2005，第6期。

[4] 曾文雄，“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反思”，《外语研究》[J]，2006，第3期。

